

丛书主编 / 瞿林东

20世纪
中国史学
研究系列

20世纪中国 史学论著要目

汪受宽
赵梅春
— 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历史网
www.chinahistory.org.cn



NON
世纪中国

史学论著要目

中国历史网
www.chinahistory.org.cn

◎ 中国历史网
www.chinahistory.org.cn

20世纪中国史学论著要目



汪受宽 赵梅春 / 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世纪中国史学论著要目/汪受宽, 赵梅春主编.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10

(20 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系列)

ISBN 978-7-303-08650-4

I. 2… II. ①汪…②赵… III. 史学—中国—20 世纪—专题目录 IV. Z88: K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82913 号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 bnup. com. cn](http://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万利装订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 mm × 230 mm

印 张: 35. 75

字 数: 560 千字

印 数: 1 ~ 3 000 册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 00 元

责任编辑: 唐正才 装帧设计: 高 霞

责任校对: 李 菡 责任印制: 董本刚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 - 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 - 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 - 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 - 58800825

总序

瞿林东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中华民族从苦难、抗争走向胜利、振兴的历史。在这一百年中，中国史学经历了伟大的变革、严峻的考验和深刻的反省。这些大多与中国历史进程相关联，也与中国史学同外国史学的交往相关联。这是我们认识 20 世纪中国史学的基本出发点。

20 世纪的中国史学，引进了进化论和唯物史观，从而引起了历史观上的两次大变革。进化论的引入，产生了中国“新史学”；唯物史观的引入，产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新史学”是中国古代史学走向近代的里程碑，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中国近代史学走向科学发展道路的历史性转折。这两次变革，是 20 世纪中国最显著的进步，这是因为，历史观的变化，必然导致人们对历史的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

20 世纪中国史学还继承和发展了 18 世纪乾嘉时期历史考证学的传统，同时又引进和借鉴了西方 19 世纪兰克史学的研究方法，形成了新的历史考证学。新历史考证学以其“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为特点，对中国历史上许多具体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填补了许多空白，大大拓展了中国历史研究领域，丰富了中国历史研究内容，同时也促进了历史学研究同考古学研究相结合、中国学者的历史研究同外国学者的历史研究相结合。这是 20 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的重要贡献。

不论是“新史学”、新历史考证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它们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都形成了极有影响的史学思潮，都产生了重要的学术成果，以至于都有可以传世的名著。正是由于 20 世纪中国史学拥有许多名著，使中国历史学在厚重的优秀史学遗产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新的珍贵品；正是由于 20 世纪中国史学拥有许多名著，使中国学人和广大读者对中国历史、外国历史有了新的认识。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于 20 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具有特殊意义。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同中国的社会革命、社会建设有着天然的联系，从而具有鲜明的实践意义；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遵循和运用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是目前各种历史观和方法论中最合理、最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这里仅就后一个方面，结合 20 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道路，作一点粗浅的分析。

一、20 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是历史观的进步

中国史学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史学上的历史观点也在不断地发展、进步。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这种历史观点的发展、进步发生了两次重大变革。一次是西方近代进化论的传入，改变了中国人对于历史的看法；另一次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入，在更加深刻的意义上改变了中国人对于历史的看法。关于前者，梁启超、顾颉刚都有论述^①；关于后者，李大钊、郭沫若、翦伯赞等也各有阐说^②。由于进化论和唯物史观的引入，尤其是唯物史观的引入，不仅加快了中国史学发展的步伐，而且推动了中国史学的科学化进程。

顾颉刚从三个方面比较了 19 世纪后半期同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史学发生变化的原因：“第一是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第三是新史料的发现”。顾颉刚在讲到“新史观的输入”时认为：“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如古史传说的怀疑，各种史实的新解释，都是史观革命的表演。还有自从所谓‘唯物史观’输入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虽然这方面的成绩还少，然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③诚然，顾颉刚所论，也有可议之处，但他关于

① 见梁启超：《新史学》（1902 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② 见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1920 年），《李大钊全集》，第三卷，216～222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1929 年），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6～10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1938 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③ 《当代中国史学·引论》，2～3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新史观的输入”促使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判断，应是符合当时中国史学实际的。

李大钊批评了“历史的宗教的解释”和“历史的政治的解释”，进而阐明了“历史的唯物的解释”，认为：“这种历史的解释方法不求其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求之于物的势力，因为心的变动常是为物的环境所支配。”他批评唯物史观以前的历史观“只能看出一部分的真理而未能窥其全体”，而唯物史观的目的“是为得到全部的真实”^①。唯物史观的流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被许多人认可和运用，因而也就不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翦伯赞撰写《历史哲学教程》的目的之一，就是批评“对史的唯物论之修正、割裂、歪曲”的种种现象，进一步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他强调指出：“我所以特别提出历史哲学的问题，因为无论何种研究，除去必须从实践的基础上，还必须要依从正确的方法论，然后才能开始把握其正确性。历史哲学的任务，便是在从一切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变中去认识人类社会之各个历史阶段的发生、发展与转化的规律性，没有正确的哲学做研究的工具，便无从下手。”^② 翦伯赞的这些话，同样也反映出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史学界对历史观发展的高度重视。

当我们将20世纪中国史学的思想历程作认真考察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事实：2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是历史观的进步。输入进化论，是一大进步；输入唯物史观，是更大的进步。

二、唯物史观怎样推动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难以作出全面、正确的回答，这里讲几点肤浅的认识。

第一，唯物史观要求研究全部历史，也可以说是要研究整体的历史。一部史学史（至少是中国史学史）告诉我们，对人类社会历史作有系统的和整体性的研究，是从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后才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史学意识。当然，以往的史学，也都不同程度地涉及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但是对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民族、中外关系等，作有系统、整体、科学的把握，确是得益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启示和指导。

^① 《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1920年），《李大钊全集》，第三卷，216～222页。

^② 《历史哲学教程·序》，1～6页。



第二，唯物史观告诉人们，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因而是有规律可循的。中国史学史上的许多先哲，着意于“通古今之变”，不断探索社会治乱之“理”、朝代存亡之“势”，努力解释“势”与“理”之中存在的“道”，即社会历史演变的法则与常规，其意颇近于后世人们所说的规律。故清代思想家龚自珍有言：“欲知大道，必先为史”^①。尽管中国学人在这方面作了许多可贵的探索，也有丰富的思想积累，然而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以前，我们的先人们在这方面的思考所得，只是停留在朴素的阶段，从而限制了人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唯物史观把人类社会历史看作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自然发展过程，揭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的演变、发展对社会历史的影响，社会历史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点，从而揭示出人们认识历史发展规律的方法论原则，也就使人们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成为可能。

第三，唯物史观要求人们用辩证的观点和方法看待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这是因为唯物史观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应从经济领域入手。但是，唯物史观同时承认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思想文化、道德风尚等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在中国史学上，司马迁写出了《平准书》和《货殖列传》，《汉书》则有《食货志》，杜佑《通典》更是把《食货典》置于诸典之首等等，显示出重视经济生活的思想传统。杜佑甚至提出了教化同食货、职官、选举、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之间的关系，把古代史家关于对社会结构、国家职能的认识提到了新的高度，以至于在此后的上千年之中，人们在这方面的认识进展都显得缓慢，并始终带有朴素的色彩。唯物史观的传入，人们的历史观念在这一领域产生了质的飞跃，经济、政治、文化相互间的关系及其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才真正得到合理的解释，并在现实的历史运动中获得实践的意义。今天看来，这已经是一个常识问题了，但中国史学在历史观念上发展到这一阶段，却是走过了漫长的道路。

第四，唯物史观最鲜明地提出了人民群众对于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民本思想的传统，司马迁还写出了《陈涉世家》这样的千古名篇。一些史家也一再强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① 龚自珍：《尊史》，见《龚自珍全集》，上册，8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明清时期史学的重民思想有了更大的发展，这些都是宝贵的思想遗产。但是，这样的思想传统要发展到更高、更加理性的阶段，也只是在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以后才能达到的。只有到这时，中国史学界才能产生如同李大钊的《民彝与政治》（1916年）、翦伯赞的《群众、领袖与历史》（1939年）这样的鸿文，揭示出人民群众在历史进程中的伟大创造作用。李大钊说得好：“历史上之事件，固莫不因缘于势力，而势力云者，乃以代表众意之故而让诸其人之众意总积也。是故离于众庶则无英雄，离于众意总积则英雄无势力焉。”^①这是对“众庶”和“英雄”在历史上作用的合理解释。诚然，结合到历史的具体事件来说，其情形可能千差万别，但其根本原理，当不超出此论的范围。

以上这些，从几个重要方面表明了唯物史观是怎样的影响着20世纪中国的面貌，怎样推进中国史学的发展，使其朝着科学化的道路前进。

三、21世纪的中国史学怎样运用、丰富唯物史观

从20世纪中国史学同唯物史观的关系来看，可以得到两点认识：一是21世纪中国史学仍将同唯物史观保持密切的联系，后者对于前者的指导意义仍将是十分重大的；二是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在更高的科学程度上运用和丰富唯物史观，从而推进中国史学的发展。

为此，史学工作者有必要在思想上和实践上关注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从严重教训的阴影中走出来。如前所述，20世纪中国史学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在取得成绩的同时，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在运用唯物史观时也走了不少弯路。从学理上看，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认识、理解、研究，确有一个发展过程，幼稚的情况是不可避免的。从历史条件上看，在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相结合的过程中，曾经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特别是政治上“左”的思潮的干扰。上述两种情况带来了两个严重后果，即或者把唯物史观简单化、教条化，以理论代替学术，或者把唯物史观片面化，绝对化，以原则代替具体研究。这两种后果的本质是一样的，既曲解了唯物史观本身，又阻碍了历史科学的研究和发展。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前的那些年代，有不同程度的反映。现在，是到了完全走出这个严重教训所笼罩的阴影的时

^① 《民彝与政治》（1916年），见《李大钊全集》，第一卷，156～157页。



候了。史学工作者应当像总结成就一样,认真总结教训,这就要求我们正视严重教训,重新学习理论,改进运用方法。

第二,进一步认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科学价值。不论是总结成就,还是记取教训,都会碰到如何看待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问题。这些基本原理,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卡尔·马克思》和《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提出的有关论断。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科学价值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理论可以用来代替这个体系。其次,它经历了一百多年历史的考验,没有被驳倒,更没有被人们遗忘和抛弃,这从另一个方面有力地证明了它的生命力,它存在的合理性。

第三,在唯物史观与具体的研究对象相结合的过程中,推动理论上的创新。从史学前辈的治学经验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上这样的启示。翦伯赞在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的“如何处理历史上的阶级关系”、“如何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如何处理历史上的国际关系”、“怎样对待发展观点”、“怎样对待全面观点”、“人民群众与个别历史人物”、“政治、经济与文化”等重大问题^①,是从理论上作出了精辟的论述。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和多卷本《中国通史》导论卷,对中国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身份的分析和国家职能的认识,对人、生产力、科学技术以及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认识等,都是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提出的新的结论。在这方面,中国史学界还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事实证明,唯物史观不会窒息人们的创造力,而是要人们去发现这种创造的方法和途径。

第四,运用唯物史观,要有气度,要有吸收那些有益的理论和方法的雅量与勇气。这是从以往史学发展中总结出来的一条教训,也是从二十多年来中国史学发展中总结出来的一条经验。遵循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不是一定要排斥任何其他的理论和方法;相反,对于那些有益的理论和方法,应当予以吸收。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使唯物史观在同各种理论和方法的比较中显示自身的特点和活力,一方面也使历史研究工作具有广阔的视野和丰富的内容。

^① 《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1963 年),见《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三),59~71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21 世纪的中国史学，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唯物史观仍将是帮助史学工作者认识这些新问题的基本理论；而新的理论认识的创造和新的研究成果的取得，需要在上述几个方面作出艰苦的努力。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道路并不全是坦途，学术问题的复杂性和科学探讨的艰巨性决定了这一点。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理论界和史学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等问题的论战；五六十年代关于汉民族形成、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的讨论；七八十年代关于历史发展动力、历史创造者以及史学方法论等问题的讨论；90 年代以来，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评价和唯物史观的科学性等各种观点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这些史学领域中的重要问题，经过讨论和辩论，有些已获得共识，有些在认识上已比较接近，有些则仍存在歧异。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在学术研究中，对于那些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总是会存在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见解、不同的阐释，而当旧的分歧消失的时候，往往又出现了新的分歧。在如此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学术研究发展了，学术水平提高了，学术工作进步了。这是学术发展的规律之一。

为了推进学术讨论和争论，扩大讨论和争论的成果，“知人论世”的历史主义方法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必须遵守的原则。尊重学术史上的积极成果，是后辈学人的本分和天职；反之，对于学术史上的积极成果持轻薄的态度，是不足取的，因为那将走上自毁学术形象的歧路。

史学批评是保证史学之树常青的重要手段。积极开展史学批评是非常必要的。批评应当是善意的，是有益于史学发展的。无原则地吹捧不是史学批评，当头棒喝似的指斥也不是史学批评，挖苦嘲讽同样也不是史学批评。史学批评应以互相切磋、共同提高为出发点，以促进学术发展为归宿。史学批评往往又是同史学领域重大问题的讨论相联系的，因此，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批评的氛围，对于推进学术讨论、促进史学发展是完全必要的。在这方面，20 世纪中国史学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经验教训。

20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一再证明，加强中外史学交流，借鉴外国同行的积极成果，是促进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外部条件。这个条件，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发挥了空前的作用：大量的外国史学成果被翻译出来，介绍给中国学者；中国学者也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治学、研究，把中国史学介绍给外国同行，从而写下了 20 世纪中国史学史上极为活跃的一章。进入 21 世纪以来，这一趋势仍在发展，它必将有利于中外史学的进一步交流和学术水平的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20 世纪中期,中国理论界已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提出了中国学术应带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些学者提出了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设想,并为此作了实际的努力。

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产生、发展的过程,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过程,只是由于人们在史学活动中所具有的自觉性各有差异,以至于走过一些弯路,出现了简单化和教条主义的倾向,也出现了否定中国史学优秀遗产和排斥外国史学积极成果的倾向。其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或者说建设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它的本质特征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尤其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同中国历史与外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提出对于中国历史与外国历史合理、科学的论述,这种论述的观点、形式和语言应具有中国学人的风格和气派;而它的基本条件则必须批判继承中国史学的优秀遗产和外国史学的积极成果;离开这个基本条件,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或建设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就成了一句空话。20 世纪的中国史学也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启示。今天,当我们面对着日益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趋势,面对中外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的形势,面对着中国史学不断走向世界的历史潮流,突出中国史学的民族特点,是非常必要的。这不仅不是“保守”的心态,而且是在史学上自立于世界史学之林的文化自觉意识。我们的先辈在 20 世纪的中国史学领域已为此作出了自己的努力,生活在 21 世纪的中国史学工作者应对此作出应有的贡献。

在 20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始终存在着一个使史学家兴奋不已的事件,即新的历史资料层出不穷。不论是考古学资料的不断出土,还是文书档案、传世文献的不断发现,以及流传到国外的各种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等等,都给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佐证,丰富了已知的历史内容,填补了未知的历史空白。记得有这样一位著名的考古学家,写一本运用考古学资料重现中国远古历史面貌的著作,可是他总下不了定稿的决心,因为每年都会有新的重要的考古学资料被发掘出来,足以充实他的学说。这样的例子,在历史学界同样是存在的。

总之,20 世纪中国史学,在新史观、新方法、新资料的推动下,显示出中国史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大发展的局面。其作者之众多,著作之繁富,也是以往任何一个世纪的史学不能比拟的。



* * *

我们撰写、编著《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系列》这部丛书，就是基于上述认识而着手的。我们的宗旨在于：第一，以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从不同的视角，对20世纪中国史学作一个研究性和资料性的描述，使专业工作者有所参考，使更多的读者有所了解。第二，学术积累历来是学术工作的重要部分，昨日之学术乃是今日之学术的起点，今日之学术又是明日之学术的开端。21世纪的中国史学，只有在充分认识了20世纪中国史学所走过的道路、所取得的成就、所积累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面对现实、面对世界、面对未来，去开拓、创造新的业绩。

这部丛书的各位主编和作者，对丛书各卷的筹划、撰写、编次，作出了可贵的努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社长、总编及各位责任编辑，对于史学领域学术积累工作的大力支持及辛勤劳动，使我们深为感动。在这里，我对他们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

2007年1月15日撰论于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前言

1902年梁启超发表的《新史学》一文，被史学界誉为中国史学走向变革的宣言，此文与其在前一年所发表的《中国史叙论》，揭开了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序幕。20世纪的中国史学继承了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并在发展中显示出鲜明的特点，这就是变革与创新。历史观的变革，历史研究方法的更新，新史料的层出不穷，历史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和深入，史学名家辈出，展现了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特征。

20世纪中国史学最大的变化是历史观的变革。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进化学说传入中国，改变了国人的历史观念，进化史观代替了古代朴素的进化观点，成为许多中国史学家研究历史、考察社会的理论指导。梁启超、章太炎、陈黻宸、邓实、黄节等，以进化史观为指导，重新审视中国历史与史学，指出历史是人类进化的过程，史学应该叙述这一过程并探求其进化发展的原理，以激发国民的民族感情和爱国热情。20世纪初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新史学思潮。在新史学思潮影响下产生的以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代表的新型中国通史著作，以进化史观为指导，将中国历史视为一个不断变化的、有因果联系的过程，这标志着中国史学完成了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进化史观对中国史学的影响持久而深远。

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20世纪20年代初所发表的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荫清《唯物的历史观与科学的历史》、蒋侠僧《唯物史观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解释》等，反映了唯物史观对中国史学的影响。1924年出版的李大钊著《史学要论》，是第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理论著作；1938年出版的翦伯赞著《历史哲学教程》，在结合中国历史实际的基础上，辩证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最早将唯物史观运用于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是郭沫若，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引唯物史观之光照亮中国古史研究之殿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翦伯赞《中国史纲》等中国通史著作，从生产



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揭示出中国历史是有规律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同时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及其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作了适当的说明，标志着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体系初步形成，实现了近代史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确立了主导地位。为了进一步促进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研究相结合，历史研究者对重大历史理论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中国古史分期、农民战争史、汉民族的形成、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等问题，成为这一时期历史研究的重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曾历经曲折。1958年“史学革命”所提出的“厚今薄古”“打破王朝体系”等口号及研究方向，使中国史学蒙受损失。而“文化大革命”期间泛滥的“儒法斗争史”，则使真正的史学受到践踏。“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史学界正本清源，对历史发展动力、历史的创造者、社会形态等一系列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再次出现史学的理论研究热潮。20世纪80年代，白寿彝提出应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进行理论创新，这表明史学界已经逐步克服了教条主义、简单化的倾向，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相结合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历史认识论研究的展开——历史事实、历史认识的主体和客体、历史认识的特点、历史认识的真理性等曾经被忽视的理论问题受到了历史研究者的重视，这是史学理论研究深化的重要表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出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既表现在历史研究的理论指导层面，也反映在历史研究的方法方面，还体现在历史研究的领域方面，中国史学处于新的发展时期。

随着历史观的变革与中外史学的交流，20世纪的中国史学研究方法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20世纪初期，胡适、梁启超提倡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研究中国历史。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等论著，对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进行了阐述。顾颉刚则运用科学的方法检讨中国上古史，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点，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古史辨”运动，疑古之风盛行，影响所及直至20世纪末。如果说疑古学派主要是以廓清古史的迷雾为目标，那么以王国维、陈寅恪、陈垣为代表的新历史考证学派则以学术建设为己任。王国维以新发现的地下之资料与传统文献相结合进行古史新证的“二重证据法”，陈寅恪以诗文证史的方法，陈垣的考证学、年代学、避讳学、史源学方法等，表明新历史考证学派一方面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的传统，另一方面吸



收了近代西方史学研究方法。他们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严谨的考证求实，使中国历史研究走上了理性的、崭新的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史学倡导的阶级分析方法、历史主义方法，以及唯物地、辩证地看待历史和研究历史的方法，更是把历史研究的方法和方法论提升到科学的境界。20世纪中国史学在研究方法上还有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是多学科方法的运用。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对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提倡将心理学、统计学等社会科学的方法引入历史研究领域。八九十年代运用多学科的方法研究历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一点在社会史的研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历史研究方法的这种变化，推动了历史研究范围的扩大，文化史、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学术思想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等，都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方面。历史研究者尝试着将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统计学、民族学、地理学等学科的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中，逐渐形成了新的历史研究模式。

20世纪40年代，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引论》中曾指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的近百年中，“新史料发现很多，一方面可以补充过去史料的不足，一方面却又决定了后期史学的途径”，“这许多新史料，给予后期史学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这是说，新史料的发现对史学研究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的影响。20世纪所发现的新史料主要有史前时代的遗址遗物、甲骨文、古器物铭文、简牍帛书、敦煌吐鲁番文书、明清档案等。20世纪的中国史学因这些新史料的出现，不断扩大研究范围，澄清纷繁复杂的历史是非，并产生了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遗址及遗物的发现，不断改变着人们的古史观念及其对史前史的认识，使从考古学入手重建中国远古史成为可能。当疑古之风盛行、学术界为古史的真伪纷争不已之时，李玄伯在《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法》（《现代评论》，1925年第1卷3期）中指出，锄头考古学是解决古史问题的唯一方法。60年代，李济提出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史学家可以凭借比较完整的古籍和出土实物，对中国上古史进行一番重新整理。20世纪90年代，苏秉琦进一步将“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作为奋斗目标，白寿彝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第二卷《远古时代》即为苏秉琦所主编。他从考古学文化入手，认真清理了中国史前民族、文化及社会的发展脉络，全面地展现了中国史前史的面貌，初步实现了20世纪考古学家以考古材料重建上古史的“中国梦”。甲骨文以及新的金文的发现，则促进了殷周史研究



的进步。王国维所撰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根据甲骨文考证殷王谱系，证明《史记》所载殷代世系基本可靠，《山海经》《竹书纪年》等史书具有史料价值。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利用甲骨文、金文资料，揭开了商代历史的面貌。这些研究逐渐打消了人们对商代存在的怀疑。临沂战国竹简、云梦秦简、居延汉简、马王堆帛书等简牍帛书的发现，对先秦、秦汉史的研究意义重大。如有关苏秦、张仪合纵连横之事，由于史书记载的歧异与错误，众说纷纭。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为澄清此事提供了依据。有关秦律及其司法实践的研究，由于资料的缺乏，长期处于空白状态。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保存了秦律的内容及其实施情况，通过研究，人们对秦朝的法律制度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居延汉简，使人们对汉代的边关制度、边疆生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发现，则极大地丰富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如对唐代是否真正推行过均田制，其实施的效果如何，学者多有疑义。一些隋唐史研究者根据敦煌文书资料，对唐代租庸调制、均田制的实施情况进行深入研究，推进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同时，这些简牍、帛书、文书本身需要整理研究，从而形成了历史学新的分支学科，如简帛学、敦煌学，扩大了中国史学研究范围、丰富了中国历史研究的内容。陈寅恪曾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识之新潮流。”^① 20 世纪著名的史学家如罗振玉、王国维、李济、郭沫若、董作宾、胡厚宣、劳榦、陈寅恪、唐长孺等，利用新史料解决新问题，形成了中国史学发展的新潮流。

20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背景下考察中国，成为历史研究者的共识。世界历史的研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成为中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何炳松、陈衡哲、李泰棻、杨人楩、沈炼之、周谷城等学者筚路蓝缕，为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建立准备了条件。周谷城《世界通史》将世界历史视为一个整体，不赞成欧洲中心论，也不赞成将世界历史当作各国历史之总和，力图从世界各地的相互联系、彼此影响过程中展示世界历史的发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周谷城将中国历史作为世界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书中加以叙述。周著《世界通史》是名副其实的 world history。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世界历史体系明显地带有了当

^① 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